

老赵和小赵

■如虹一沫

法庭礼仪

□卫 洁

□魏福春

老赵和小赵是偶然认识的,老张说是在一次聚会上。那天是老王做的东,一桌整整有15个人,有好几位是朋友带来的新朋友,小赵就是其中的一位新朋友。这天的聚会一如往常,喝酒、聊天。谁也想不到老赵和小赵就此成为了好朋友。有时想想真是奇特,两个年龄相差20多岁,又只是在酒桌上一面之交,竟然哥俩好,好哥俩,比相交相识多年的朋友还要亲近。

不过老王、老张他们是睁大着眼睛的,多次旁敲侧击要老赵注意,说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,不能光看表面,害人之事不做,防人之心要有。老赵就笑:想多了,哪有那么多的坏人!老赵一个人居住,儿子媳妇婚后去了国外。提起儿子,不仅老赵两眼发亮,老王、老张等老朋友也为他高兴。老赵不容易啊!老赵原在机关工作,当年他辞职从商时,同事老王、老张都

一再劝他,万不可意气用事。老赵是他们几个人中进步最快的,副科长的任命不日就要宣布。可老赵心意已决,谁劝也劝不回头。他是为了儿子。老赵的爱人死于难产,那时他母亲还健在,在母亲的帮助下,老赵又做爹又当妈。儿子蹒跚学步了,上幼儿园了,读小学了……老赵的母亲是在孙子小学临近毕业之际离开人世的,也就是这时,老赵辞掉了工作,他需要时间,他要为儿子的成长打好坚实的基础。

奥数、英语,钢琴、绘画,别人家孩子报名的,他儿子也一样不放弃。风里来,雨里去,助动车换了一辆又一辆,一晃10多年,他付出的心血有了回报:儿子如愿考进了市重点高中;走进了他心仪的大学;本科读完是硕士,博士是在国外……

儿子媳妇一直要接他过去,说:爸该享享清福了!老赵始终没点头,说:我在这里很开心

的。这里有老赵的许多朋友,比如老王。老赵忘不了,他刚下海的时候,一次进货时被人骗了5万元,那几乎是他所有的流动资金,打击是巨大的。老赵其实是很谨慎的,机关工作几年见过的人和事不少,想不到栽在了老同学手里……他更想不到的是,老王知道后当晚就把5万元送到他家里。那时的5万元不说是个天文数字,也是一个普通机关干部一年多不吃不喝工资收入的总和!还有老张,老赵忙不过来时,孩子接送、包括帮他送货,都是老张开着那辆桑塔纳……

然而老赵和小赵越走越近,老王老张哪里放得下心,老赵独自一人过日子,时间长了心里难免——禁得起小赵的花言巧语?这个周末的下午,老王老张两人在茶坊喝着茶又谈起这事,老王猛然想起,那天是老杨带小赵来的,随即拿起手机,不料“号码不存在”。老王的心骤然一沉,这老杨是通过老秦认识的,

他们之间并无多少交往。

不怎么熟悉的老杨,以及更不熟悉的小赵——老王老张面面相觑,忽然有一种后怕,老赵近来很少和他们联系,是不是被小赵如簧巧舌——不禁异口同声:去老赵家!

秋高气爽,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,两人骑着“小黄”,不消片刻,到了。老赵在家,小赵也在,还有个小朋友,是小赵的儿子。

谜底瞬间揭晓。原来小赵崇拜老赵,老赵青春焕发。这不,小赵带着小小赵登门拜“师”来了。

小赵是单身爸爸,他事业顺利,却被顽皮的儿子弄得焦头烂额,认识老赵后被老赵辛勤培养儿子的故事所感动,常来讨教。老赵在小赵身上看到了自己早年的身影,格外亲切,自告奋勇地要小小赵的成长出点力……老赵的生活更充实了,除了和老友把酒言欢,又多了份天伦之乐。

事情就这么简单。老王看看老张,老张看看老赵,不约而同道:晚上找个地方庆祝一下!

大清“汉奸”

■赵 威

当年,马戛尔尼使团来给乾隆皇帝祝寿,死活不肯下跪,弄得中国君臣很没面子;有人就给大清的面子找了个台阶下——夷人的膝盖不会打弯,让他们“卑躬屈膝”存在生理上的障碍,这种说法影响到后来的鸦片战争。通商不成,英人以鸦片夹着大炮卷土重来。林则徐奉命整饬海防,两次给皇帝汇报,英夷“腿足裹缠,结束紧密,屈伸皆所不便”,登岸后,我方用不着派兵,让老百姓手拿竹竿,棍扫一大片,然后像切西瓜一样切英夷脑袋即可。然而,这种诱敌登岸、近身格斗的战术,屡屡不见奏效,夷人沿海岸线一路攻城略地。面对敌人的热兵器 and 接踵而来的失败,那些曾在皇帝面前夸下的海口,成了莫大的讽刺,难以解释又不便解释,怎么办?饱读诗书的儒官,终于为失败从道德上找到了“原因”——汉奸太多。

“汉奸论”一出,从上到下,普遍认可。吓得当时大买办伍氏家族的人赶紧跑到林则徐面前表忠心,愿意捐出全部家产为国效力,林则徐鄙夷地说:“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,只想要你的脑袋!”广州的洋商甚至不敢在街头张贴的布告前驻足,怕牵连自己的买办,因为凡是教洋人学中文的都是大汉奸。这样,失败的羞辱和愤怒找到了发泄的出口,汉奸似乎无处不在,带来的意外收获也远不止此,汉奸成了官府法办一切不合作者的理由,而且堂而皇之。1842年7月15日,海龄将军下令关闭镇江城门,逃难的民众聚集抗议,海龄以汉奸之名杀之,并纵兵全城搜捕汉奸,开始了为期六天的抢掠。官方能以汉奸的名义剥夺一切,包括财产和生命。后来,英国军舰和大清水师在镇江江面上交战,中国百姓在岸边围观,当挂着黄龙旗的战舰被击沉时,百姓并不悲伤,反而喝倒彩,这一幕连英军也看呆了。英军登陆后,百姓们则争相卖给他们所奇缺的淡水和蔬菜。

不过,在交战区,确实存在“汉奸行为”。虎门要塞失陷,“著名汉奸”琦善被革职,继任者手里无可用之兵,便悬赏召回和英国人做交易的“汉奸队伍”,用他们来御敌。结果,大炮一响,伴随英国战舰进入内河的是无数鸦片走私小船,被收买来的这支队伍忙于

同鸦片船只交易,炮声一停,交易也做完了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英法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之前,先炮击了广州,俘获总督叶名琛和巡抚柏贵,并把柏贵带到英国军舰上,继续“巡抚”广东。一开始,广州百姓不希望洋人进城,认为是汉奸(无能的官员和奸诈的商人)出卖了城市。然而,等联军衙门禁止这一地区贩卖人口的“猪仔贸易”和取消对小店主的抽厘税后,当地百姓对此表示认可。人们感受到这个傀儡政府比旧政府办事更公平,尤其当周边地区发生红巾军叛乱时,广州一片安宁,于是,人们竟忘记了这是一个汉奸傀儡政府,反而寄希望于联军衙门革除更多的腐败和不公。当洋人和皇帝达成协议后,联军衙门不再管理地方事务,人们反而变得忿忿不平。

“汉奸乱象”成了晚清一道别样的景观,一顶顶汉奸的帽子被抛来抛去。全力支持林则徐抵抗洋人的龚自珍,怎么也不会料到,自己的儿子龚半伦不但带着洋人洗劫了圆明园,还代表洋人和大清国谈判。清朝谈判代表恭亲王当面怒斥:“你等世受国恩,却为虎作伥,甘做汉奸!”龚反驳道:“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,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,只得乞食外邦,你骂我是汉奸,我却看你是国贼。”有意思的是,指责别人为汉奸的恭亲王,也被时人看作是汉奸,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,因留在京城与洋人谈判,人送外号“鬼子六”。

大清的臣民谁也不愿意带上汉奸的帽子,为何还是有人像龚半伦一样,甘当“带路党”,带着洋人打大清呢?因为大清早已不能替他们做主。官民相仇,百姓愿借洋人之手报仇,如虎门失陷后,当地百姓趁机发难,揭竿而起……表面看,大清似乎不是败给了洋人,而是败给了汉奸,实质上,“大清汉奸”是个人心问题。平地里让臣民弯下腰去,做奴才;战事一起,又希望他们直起腰杆抵御外侮。结果只能是,直起的腰杆既要抵御外侮,也要把皇帝老儿拉下马来。

对此,早在两千多年前,孟子就一语道破:国不知有民,民亦不知有国。



瑞犬迎新春

艾警春 摄

政府资助“民告官”体现法治思维

□沈 栖

去年9月,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》,提出通过法律援助、司法救助等方式,让行使诉权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顺利参与诉讼。作为最高院确定为这项工作的全国试点城市,南通市日前作出了积极回应:该市中院、市司法局、市政府法制办联合发布《行政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(试行)》。这一规定,在全国率先将行政诉讼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,南通市政府今年将出资150万元帮助行使诉权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更理性、更充分地参与行政诉讼。南通市政府资助“民告官”体现出行政机关的法治思维。

众所周知,行政诉讼就是被管理人(自然人/法人)认为相关行政行为有悖法律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政府花钱给相对人提供法律援助,不怕自己的行政行为有不当之处被推上被告席,这既显示了相关政府机构接受相对人监督的诚心,更是彰显出其依法行政的自信。

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

10月1日实施以来,作为“民”的一端,额手称庆,欣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了一条法律途径;而“官”的一端呢,情形呈现多元,诸如把“民告官”视为百姓找政府麻烦,或担心“民告官”,政府一旦败诉有失颜面,有贬威信,或鄙视“民”的诉讼地位,政府找个律师应付官司,或通过威逼、恐吓、利诱等方式逼当事人撤诉,甚或政府出面干预行政诉讼,对司法判决拒不执行。“行政长官出庭应诉”常被媒体作为重大新闻加以宣传,足以说明我国行政诉讼尚处于低迷状态。上述最高院的《意见》和南通市政府的举措对扭转这一态势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南通市出资援助“民告官”,鼓励百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、化解矛盾,这与回避官民冲突而产生接连不断的上访甚至闹访相比,无疑是一种文明和进步。“民”得到了政府资助,得到了法律援助,“民告官”的官司肯定一时会多些,但它却可以促使更多的民众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使问题在法治化的轨道内得以解决,有利于社会稳

定。政府官员走上法庭,有理摆理、有错认错,直接听取民声,也有助于强化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,促进“官”和“民”实现良性互动和平等交流。

鉴于纷繁复杂的原因,“民告官”的具体案例,理未必在“民”一方,错也未必在“官”一方。南通市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力助“民告官”,让当事人得到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,这对行政机关自身有利无弊。试想:倘若行政机关有违法之处,通过诉讼及时予以纠正;倘若并不涉及行政机关违法,而是“民”对行政行为不理解,一经由援助律师这一第三方的公正参与而解疑释惑,便可避免了上访给当地政府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疲于应对。

从长远看,政府资助“民告官”,有助于厘清秩序,突显法治,当出现行政争议,民众正当的权益诉求全然通过援助律师和诉讼渠道予以解决,当会锐减乃至杜绝不当信访、极端行为等非诉讼方式,以促进公平、和谐、诚信的法治社会的建立。